

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

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

罗永麟

著

齊魯書社

罗永麟 著

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

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 / 罗永麟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9

ISBN 978-7-5333-1866-6

I. 论… II. 罗… III. 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105 号

论中国文学发展规律

——文人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位一体论

罗永麟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 32

印 张 13.625

插 页 3

字 数 342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866—6

定价: 29.00 元

卷 头 语

在现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对于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元论,已变为二元论或多元论。如果要探索什么历史规律,就会被认为是将事物的发展,机械地装进一个固定的框框。因为研究历史不在找寻什么规律,而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只能就事论事,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所以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在文学史表现出来的,只有所谓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现象,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文学发展规律。但是深入研究,历史事实并不如此。证以我国古老的、至今仍可借鉴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观,根据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情况,好像都蕴藏着不可蔑视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用文字表现的文人文学,是显现的,而用口头流传(无字之书)的民间文学,却是隐显的。隐显的民间文学和显现的文人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相结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结合得好,就形成一个时期的文学高峰,反之,就形成文学的低潮。衡之中外文学史,无不吻合。由此可见,探索文学的发展规律,并不是制造什么固定的框框,而是寻求打开文学发展的规律的钥匙。道理很简单,就是看怎样加以理解。

上 篇

《诗经》与民间文学

(一)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创作。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就蒙上了一层纲常礼教的迷雾，尤以汉儒卫宏继承毛诗传统，加以总结而成的《诗序》，更是附会其辞，任意加以曲解。“五四”以后文学研究者对《诗序》几乎全盘否定。不过实事求是，就大序的内容而论，其中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和“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却保存了我国诗歌产生的原理和歌谣搜集整理者的经验，从而得出了诗歌风、雅、颂的体例，以及赋、比、兴的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不可完全否定。因《诗序》的失误，不在于诗的原理，而在于忽视了《诗经》的社会内容与文学价值。虽然欧阳修、郑樵都对《诗序》有所驳斥，而朱熹对风诗也有新解：“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但他对于诗教的解释：“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诗集传序》）还是没有跳出《诗序》“原人伦，美教化”的圈子。如果要真正了解《诗经》，仍必须从其体裁和表现手法入手。风诗既是民间里巷歌谣（徒歌），而雅为卿、士大夫、文人所作，颂是贵族的庙堂文学。就文学理论来谈，诗歌的源泉，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换言之，就是鲁迅所说：“原始人……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门外文谈》）这就是最早的歌谣——劳动歌。《诗经·行苇》“或歌或号”，号，古音读若啊，就是杭育派的语助词。回忆儿时重庆南岸乡下高唱山歌，就以啊为发语词开头，拉长声音，隔山都能听到，恐亦古代歌谣的遗韵。^① 杭育派是最早的民间文学。《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能就是从杭育派总结出的规律。所以研究《诗经》必须从民间文学入手，才能得其奥秘。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者坚持《诗序》的传统观点。如新中国成立后新出版的朱东润的《诗三百篇探故》就重新提出异议：一则曰：“《诗》三百五篇，论者以为出于民间，然考之于诗，有未敢信者……谓《诗》三百五篇为民间之作。今果能确然指为《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者，则《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一则曰：“《国风》诸诗果为诸侯卿大夫列士间之诗，则其不得称为民间之诗者可知矣。”其实“五四”以后学术界并没有人

^① 四川诗人吴芳吉有诗可证：“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俞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巴人歌》）

说《诗》三百五篇全都出自民间，宋儒朱熹等也只不过说《国风》和《小雅》一部分为民间里巷歌谣，其实这不过是朱氏的泥古思想自我作祟。他根据《诗序》而作的《“毛诗序”“国风”作者表》，因为《诗序》本身就靠不住，已为古今学者的共识，而朱氏振振有词地大做翻案文章，无补实际，可谓用心良苦矣。

(二)

因此，我们觉得现在再提出《诗经》和民间文学（民俗）的关系问题加以讨论，并非过时。不过，我们现在谈《诗经》和民间文学的关系，不能笼统而言，因为民间文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国风》中的里巷歌谣，只是《诗经》中的一部分；广义而言，诗歌既起于民间，就雅颂之诗的内容和形式而言，显然也受着民歌的影响。从而说《诗》三百篇出于民间也说得过去，何况根据社会文化发展史，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来自民间。一部《诗经》从风、雅、颂的发展线索加以分析，本来是从民间的徒歌逐渐发展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乐歌，虽然历来对《诗经》是否全是乐歌就有争论。司马迁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世家》）孔子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这里虽没有直接谈到《风》诗入乐与否，马瑞辰却补充说：“《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得统之以周乐也。”（《毛诗传笺通释》）顾颉刚的《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也是继承了儒家传统说法，认为诗三百篇，未有不入乐者而加以解释。他的中心论点，是从他另一篇《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得出的结论：

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

沓。惟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

说风诗,也是乐诗,作为民间音乐的一种,这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它与贵族、卿、士大夫的雅、颂是有区别的。就是现在也有所谓俗乐和雅乐之分。但是顾氏说歌谣唱完就算,只有一章,其他重复的乐章,却是乐师的申述,为奏乐的复沓关系而加。当时魏建功、张天庐氏都不同意,加以驳难,认为顾氏的假设不能成立。^① 因为古代歌谣,从民间文学的规律——重复律而言,歌谣多和音乐舞蹈相结合,所谓载歌载舞,必须往来重复,歌舞者才能尽兴,至今在少数民族中也常见到。十几年前笔者在云南楚雄就曾亲历其境。至于《诗经》中的歌谣,是不是“歌谣的本相”,本来不成问题,可以说既是本相,也非本相,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诗经》中的歌谣,是经过采诗人的搜集、整理,然后交给乐官,再行谱曲。经过几道加工,既不是徒歌时的本相,也保存着徒歌的原型。顾氏的失误,就在于他不了解民间文学的内在规律,而以俗曲作证,提出无根据的假设,有以致之。

关于《诗经》风、雅、颂的搜集、整理的时间先后问题,现在一般中国文学史,多以成书的年代而加以论定,认为《颂诗》为早,其次是《二雅》,最晚才是《国风》,这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从诗歌的起源立论,既然徒歌的歌谣产生在先,而贵族、卿、士大夫的诗歌,都是在仿效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那就应当以风诗为先。从雅、颂的表现形式看,采用民歌的重复律和语助词

^① 参阅《古史辨》第三册,魏、张氏的文章。

“兮”、“些”，也说明了谁先谁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以上简单的分析，可见《诗经》中的风、雅、颂的体裁和表现形式，产生的时间先后，都应归根于民歌本身，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诗经》和民间文学的关系。

(三)

了解了《诗经》和民间文学的关系，现在我们就直接研究《诗经》中的民间歌谣——风诗吧。现以《国风》和《小雅》中可以视为民歌的作品，初步分类如下：

(一)情歌：《关雎》、《卷耳》、《汉广》、《草虫》、《殷其雷》、《江有汜》、《野有死麕》、《柏舟》、《绿衣》、《匏有苦叶》、《静女》、《桑中》、《君子行役》、《采葛》、《大车》、《将仲子》、《遵大路》、《山有扶苏》、《狡童》、《褰裳》、《丰》、《风雨》、《子矜》、《东方之日》、《绸缪》、《蒹葭》、《泽陂》、《东山》、《采芣》。这当中有写小伙子爱上一个美丽姑娘，终成眷属的（《关雎》），有写失恋痛苦的（《汉广》），有写悼亡感情的（《绿衣》），有写抗婚钟情的（《柏舟》），有写怀人服役在外的（《君子行役》），也有写戏谑意味的（《褰裳》）和先拒后迎的（《丰》）。描写爱情的复杂性，在风诗中真是无所不有，而其写男女幽会之诗，尤其深具情歌的特色。如写幽会，含蓄而颇具情致的《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椒，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犬也吠。

这是写一个猎人引诱一个美丽的姑娘，彼此相爱，叫他到家去幽会。20世纪20年代《歌谣周刊》讨论此诗，顾颉刚、胡适、俞平伯等都曾参加过讨论。顾氏最初对卒章主句的解释为“你慢慢儿的来，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感’（借

为撼)是摇动,不要使狗叫(因为牠听见了声音)。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是能深入体会诗意的分析。但胡适读了顾文后,提出不同的意见:“(1)你解第二句为‘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2)你下文又用‘女子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字样,这两句合拢来,读者就容易误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团》里说的‘干哑事’了。”胡氏显然露出了道学究气味,避开性爱的关系不谈。还是俞平伯说得好:“我对此章作解,微与你俩(指顾、胡)不同。我以为卒章三句乃是三层意思,绝非一意复说,‘无使犬也吠’意在没有声音,便作幽构。若‘无感我帨兮’,本意既不在有声音与否上面,你们所论绝未中的,反觉疑惑丛生……你俩真还是朴学家的嫡派呀!必须明白‘舒而脱脱兮’是一层意思,‘无感我帨兮’是一层意思,‘无使犬也吠’,又是一层意思,一层逼进一层,然后才有情致;否则一味拒绝,或一口答应,岂不大杀风景呢?”俞氏到底有诗人气质,故能体会民歌幽会的情趣。可惜俞氏忽略了两个“兮”字和一个“也”字语助词的意味。这两个“兮”(啊)字,实际是描写了喘息(长言)的声音,真是把幽会时的情境,描写得生动含蓄,意趣无穷,妙不可言。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现在知识分子,因受儒家传统礼教思想的影响,畏惧描写性生活。殊不知性爱是爱情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缺之乏味,具有则性与情浑然一体,怎么能够不加以剖析呢?

对于《风雨》,过去有的解释为夫妻重逢而流露喜悦的心情,其实这首诗应当理解为是描写一个女子和情人幽会时的热爱情境的情歌。将风雨之夜,邀约情人幽会,当相会时,风急雨骤,鸡鸣不已,惊喜不禁的心情,反复加以描绘。尤其在那天将拂晓,天色更加黑暗,而鸡更是啼叫不停,意在暗暗地催促情人分手,而又难舍难分的情境,使人读时惘然若失,如身临其境。

如果不是民间歌人无所顾忌,大胆描写,而文人士大夫,是难于具有这种热烈的情怀的。

(二)《诗经》中除了突出情歌的民间文学浪漫色彩——热情奔放,其次就是反映老百姓丰富生活的民俗歌谣:有关婚姻习俗的,如祝贺新婚的《桃夭》;描写男女相聚,歌舞择配的《摽有梅》;反映古代民间婚姻自由因素,探望未婚妻的《匏有苦叶》;描写迎娶之俗的《著》和请媒习俗的《伐柯》;反映劳动妇女在贵族家辛苦生活的《葛覃》;描绘贵族家女儿出嫁,女仆采蘋祭祀的《采蘋》。真是各陈异彩,真实感人。

(三)描写反对剥削的劳动怨歌:《式微》、《伐檀》、《硕鼠》等。风诗如此,在小雅中也有类似的《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与
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
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据高亨的解说:“西周亡后,开始有了新兴地主和佃农,产生实物地租制度。诗的作者是个佃农,他从别地到西周王畿来,租种地主的土地。可是西周王畿的地主们剥削比较他原住地区的地主更残酷一些。而且他举目无亲,在生活上更感到困难。所以想回到原住的地区去。”(《诗经今注》)

其次就是老百姓怨恨、讽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施行暴政的歌谣。如以蝗虫纷飞比喻统治者的子孙众多,剥夺农民粮食的《螽斯》;讽怨童养媳痛苦的《芄兰》;讽刺怨恨统治者华衣逍遥,而自己则光身劳动于旷野的《有狐》;讽刺齐襄公与异母妹私通乱伦的《南山》;描写劳动人民怨恨长期徭役在外、发泄痛苦的

《鸛羽》；反映女奴不堪主人虐待而发出的讽怨之声的《葛屨》。最令人发指而毛骨悚然的，是描写秦穆公以车氏三兄弟殉葬（据史载杀了177人为他殉葬）的《黄鸟》（《秦风》）：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是秦国人民哀悼车氏三子，认为他们是英勇杰出的人才，愿意用一百人赎他们之中一人的性命而不可得，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王侯草菅人命殉葬制度的残酷性。墨子强烈反对厚葬制度，尤其反对以人殉葬，这是当时民间意识的普遍反映。无怪《诗经》中讽刺怨怒之诗特别丰富，这是偏信《诗序》的人难于理解的，却是搜集、编选《诗经》的人用心所在，值得读者深思。

再次，农事史诗在《诗经》中的地位，更值得我们深加体悟。这类诗有《甫田》、《大田》，但以其中最早的一篇民歌《七月》（据梁启超考据似应为周人自‘豳’迁‘岐山之前’之民间作品）描写最为朴素真实，它是我国古代反映农民艰苦劳动和生活过程的最佳农事史诗。为使读者了解古代农事情况和其文学价值，全文录出如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鸛，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萆。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缿武功。言私其纵，献豸其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剥(扑)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瓠)，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种)穆，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官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窖)，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饗，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首最早的民歌(农事史诗)，一方面描绘农民为封建地主耕田种地，养蚕，织布，酿酒，打猎，藏冰，祭祀，称觴祝寿，夜以继日，忙碌无休的辛劳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劳动终年，自己却单衣短褐都没有，吃苦菜，烧臭樗，住破屋，填地洞，熏老鼠，塞窗糊门，防寒过年。两相对比，农民一年劳动所得的好庄稼和猎物都献给了封建地主，即使捕捉了野猪，大的要献给地主，而自己只

能留下小的野猪。这首农事史诗还只描写了古代和平安定时期的农民辛苦生活,而在乱世荒年其所受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民歌之可贵,就在于它们能够真实地反映阶级社会的生活情况。

(四)《诗经》风诗中除了以上几类平民歌谣外,也还有下层文士、不得意的小官吏和士卿、弃妇等所作的讽刺歌和怨恨歌:如讽刺统治者荒淫无耻,不守礼治的《相鼠》;反映妇人被丈夫遗弃而自悼的《谷中有蕓》;还有不少记述史事的史事诗,如写犬戎破镐京,杀幽王,有士卿返京,眼见宫庙皆毁的《黍离》,描写晋侯与弟争位的《扬之水》;还有讽刺女巫的《宛丘》、《东门之枌》;写赞扬山林隐士的《考槃》和自我抒怀的《衡门》……不一而足。这说明《诗经》中里巷歌谣的丰富多彩,真可谓诗歌的百科全书。由此可见,读《诗经》不仅要欣赏其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应当深入领悟其饱含的人民之声。

(四)

研读《诗经》本文之余,我们还应当注意其中蕴藏的饱含民间意识的古代成语,以及由其诗中警句流传而变为后世的典故和成语。择要抄录于下,以供参考: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通侮)(《常棣》)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伐木》)

乐只君子,万寿无疆。(《南山有台》)

忧心如惓(借为炎),不敢戏谈。(《节南山》)

黽勉从事,不敢告劳。(《十月之交》)

听言则答(拒绝),谏言则退(采纳)。(《雨无正(应作止)》)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小旻》)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上）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宛》）

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巧言》）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鸣》）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正月》）

取彼谗人，投畀豺虎。（《巷伯》）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莪》）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同上）

溥（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北山》）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采葛》）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黍离》）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木瓜》）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氓》）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同上）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野有死麇》）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巢》）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园有桃》）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角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

嘉穀脾（牛胃）臄（牛舌），或歌或号。（《行苇》）

岂弟（同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泂酌》）

民亦劳止，汔（庶几）可小康。（《民劳》）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荡》）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抑》）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同上）

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同上）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同上）

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同上）

兢兢业业，如霆如雷。（《云汉》）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同上）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烝民》）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同上）

柔则茹之，刚则吐之。（同上）

总之，一部《诗经》，从本文所引用的诗歌和民谣以及成语、典故的例子即可证明，过去它虽被儒家奉为伦常礼教的经典，而其实，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与斗争历史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实录，并不是什么伦理教科书。

屈原与民间文学

(一)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著名的诗人,是《诗经》以后,采用楚国民间歌谣——骚体,加以整理和从事创作的集大成者。但是关于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真伪问题,历来争论不休,甚至有否认其人者。廖季平就说无屈原其人,胡适也说他是一个箭垛似的人物。作品除《离骚》和《九章》的《橘颂》、《柚思》、《涉江》、《哀郢》、《怀沙》以及《远游》和《九歌》,被认为是屈原加工改写与创作外,其余都存疑。这些问题,本文不拟讨论,而只研究屈原和民间文学的关系。不过,首先要承认历史上确有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据《史记》所载,他曾做过左徒和三闾大夫。左徒是史官,兼掌天文历数。三闾大夫的职务,是掌握楚国王族三姓谱属、宗庙的工作,近于祝史,古代巫卜之官的性质。故近人有考证其为“巫”者,因与这官职有关。不过据闻一多的考证,屈原实际上是楚怀王的文学弄臣^①。他并且说:“战国是一封建阶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已被打落

^① 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卷一,开明书店1948年版。